

Dialogue
Transcultural

跨

文化对话

科学到底是什么？
是人与自然对抗的工具吗？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只知有两，不知有三，
就会闹出人为的麻烦

5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先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跨

文化
对话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对话.5/乐黛云等主编.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ISBN 7-80646-258-9

I. 跨… II. 乐… III. 比较文化-研究-文集 IV.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848 号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陆震伟

跨文化对话(五)

主编〔中〕乐黛云〔法〕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6×939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70,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646-258-9/I·311

定价:19.00 元

本丛书列入法国夏尔-雷奥波·马耶
人类进步基金会(FPH)

面向未来的文化向文序

《跨文化对话》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音序排列)

中国委员

- 丁光训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金陵神学院院长,宗教学家,教授
丁石孙 北京大学前校长,数学家,教授
季羡林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印度学专家,语言学家,教授
李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教授
厉以宁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教授
庞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教授
任继愈 北京图书馆馆长,哲学家,教授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家,教授
王元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张岱年 中国孔子学会会长,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张维 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学家,教授

西方委员

- Mike Cooley 英国布莱顿大学技术科学委员会主席
Antoine Danchin 法国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生物学教授
Umberto Eco 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系教授,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哲学家
Xavier le Pichon 法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地质地理系主任、教授
Jacques Louis Lions 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
Carmelo Lison Tolosana 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孔普鲁登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
Alain Rey 法国词典学家,国际词典学联合会主席

《跨文化对话》编辑委员会成员

主编 乐黛云教授(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与传真:(010)62752964

E-MAIL:Tjydy@pku.edu.cn

主编 李比雄教授(Alain Le Pichon,欧洲跨文化研究院)

通讯地址:Universite de Cergy - Pontoise, 33bd du port 95011
Cergy - Pontoise

电话:0033 - 1 - 34256166 传真:0033 - 1 - 34256267

E-MAIL:lepichon@paris.u-cergy.fr

执行主编 钱林森教授(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025)3594733 传真:(025)3309703

E-MAIL:lsqian@nju.edu.cn

执行副主编 杨正润教授(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025)3593917 传真:(025)3309703

E-MAIL:zyang@nju.edu.cn

执行副主编 郝铭鉴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021)64372608 传真:(021)64332019

E-MAIL:csbcm@public 1. sta. net. cn

编委会巴黎联络处主任 金丝燕博士、副教授(Dr. Jin Siyan, 法国阿尔瓦德大学)

通讯地址:15 Rue Victor Cousin, 75005 Paris, France

电话:0033 - 1 - 56240483 传真:0033 - 1 - 56240921

执行编辑 李国强副编审(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021)64372608 传真:(021)64332019

E-MAIL:csbcm@public 1. sta. net. cn

卷首语

乐黛云

[法] 阿兰·李比雄

本辑开辟了两个新栏目：“科学与人文”，是为了进一步探索二十世纪以来疯狂发展的科学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特别是如果人类每天摄取的食物都是人为的“转基因”食品，人类自己的基因密码也正在被破译、被改造、甚至被垄断时，人类生活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两位当代顶尖科学家来为这个栏目提供开篇之作。一位是法国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巴斯德研究中心主任安托瓦纳·唐善（Antoine Danchin）教授；另一位是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项目执行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人类基因组重大项目秘书长杨焕明博士。另一个新栏目“中国文化发微”是想更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深层模式和思维方式。庞朴先生发表于本刊第一辑的“道家的玄思和先民的纺轮”在法文版《跨文化对话》第一辑（法国 Seuil 出版社 2000 年出版）发表后，引起很多外国读者的兴趣。本期特约庞朴先生将他的名著《一分为三》的精华在此加以发挥和阐述；李零教授的《中国方术史》名震遐迩，这里发表的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公开讲演，谈到中国最早的巫术等十分有趣的问题。

“圆桌会议”主要讨论了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孤立主义）的问题，也就是从希腊哲学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一直在讨论的“普遍与特殊”的问题。时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目中，这也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人一生下来，就被“嵌陷”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不能不受种种规范的诸多约束；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极力挣脱这些约束，以求个人的自由发展。扩而大之，各个民族都有保存和发展自己特殊文化的权利，但同时又必须遵守一个最低的共同规范，否则差异就难以共存。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最低的共同规范”往往成为文化霸权主义强加于其他民族的遮羞布；而强调零碎化、离散化、各自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又往往成为文化孤立主义的借口。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所长、《人性》杂志主编、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克莱斯·瑞恩（Claes Ryn）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三次公开讲演，就以上问题和北大师生展开了广泛讨论，特别是他提出的如何对待“新雅各宾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想法，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围绕这一中心，我们组织了一组很有意思的笔谈。叶舒宪教授虽未直接参与笔谈，但他的“道家伦理与后现代精神”却恰与笔谈的中心问题遥相呼应。

另外，法籍华人艺术家熊秉明同钱林森教授关于艺术、哲学和宗教的对话，画家范曾的美学随笔都有很为精彩睿智的内容，值得一读。

本辑作者介绍

唐善

Antoine Danchin(法国):

法国巴斯德学院生物学教授

杨焕明(中国)

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人类基因组主任,博士

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法国):

法国著名学者

程抱一(法国):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诗人、作家

克莱斯·瑞恩

Claes Ryn(瑞士)

美国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讲座教授,美国《人性》杂志主编

王岳川(中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陶东风(中国)

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沛(中国)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庞朴(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

李零(中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熊秉明(法国)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雕刻家

钱林森(中国)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叶舒宪(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弗朗索瓦·于连

François Jullien(法国)

巴黎第七大学教授

范曾(中国)

南开大学艺术史教授、画家

陈焜(中国)

旅美学者

孙小礼(中国)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目 录

卷首语

乐黛云

[法]阿兰·李比雄

科学与人文

自然与人为

[法]安托瓦纳·唐善 (1)

关于唐善教授《自然与人为》的回应

杨焕明 (9)

海外专递

世纪与宽恕(续)

[法]德里达 (25)

法国当代诗人与中国

[法]程抱一 (32)

圆桌会议

关于普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笔谈

新雅各宾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瑞士]克莱斯·瑞恩 (50)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

王岳川 (64)

解构本真性的幻觉与神话

陶东风 (70)

对“一”的信念

张 沛 (79)

中国文化发微

“三”的秘密 庞 朴 (85)

绝地天通 李 零 (100)

——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

前沿碰撞

艺术、哲学、宗教及其他 [法]熊秉明/钱林森 (111)

文化透视

道家伦理与后现代精神 叶舒宪 (130)

说东道西

为什么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 [法]弗朗索瓦·于连 (146)

文化随笔

大美不言(下) 范 曾 (157)

欧洲游历断想 陈 焜 (164)

要籍时评

莱布尼茨《中国新事萃编》 孙小礼 (179)

——三百年前轰动欧洲的书

信息窗

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巴黎举行 (31)

法国拉罗舍尔大学亚太研究所积极开展跨文化对话 (84)

自然与人为

[法] 安托瓦纳·唐善

假如除去源于生命的形态，则自然中形态的多样远远不是无穷的。自然的多样性遵循着许多规则，以永久地保持固体——四面体、立方体、八面体、十二面体、二十面体——的基本属性，或者更为复杂的结构之属性。在这些结构中普遍存在着形式的守恒，并不受研究者对物体进行研究的规模大小的影响——贝诺特·曼德尔布洛特(Benot Mandelbrodt)称其研究之物体为不规则的碎片。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仅仅孤立地看一块石头或泥块就足以弄清它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生命总像是某种人工的结果。当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科学家们在分析来自火星的陨石时，发现有些陨石是管状的，于是他们就把它当作火星上有生命的见证，并试图使全世界相信这一点。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即便是没有生命形式，泥土不仅能生发出树状结构，而且也会形成管状或小球体结构，而这些形式确实与生命体不无相像之处。但无论如何，这些形式的丰富性与规则性都距生命形式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相去甚远。

因此，对于生物学家来说，生命与无生命的自然一眼就能区分开来，因为即使变成化石，生命形式也展示出某种任性与专断，某种具有创造力的特性，而通常的物理法则是不允许事物轻易达到这种状态的。与此相反，对于不懂生物学的门外汉来说，至少在今天的西方文明中，自然的概念已蕴含了某种生机：一片纯矿物场地会被认为是死气沉沉、冷酷无情的，而人们当作自然的是那些被赋

予了生命火花的东西。某种化学药品,如果是经设计制造出来的,就被当作是人为的,而同样的化学物质如果直接从植物或动物身上分离出来,则会被认为是天然的。与此形成对比,所有的文明都依赖于一种正相反的自然观。每一文明都竭力将人从自然中分立出来,人统治自然,人制定的规则与自然规则不相吻合——每一文明都按照这一事实规定人的特性,即便是把自然当作动物来看待也是如此,或者正由于把自然当作动物才是如此。甚至是巫术,在使用天然物品时,赋予它们一些性质,使操作者可以辨识出非人性的自然及人性之间的区别。The practice of ordaly^①被认为是最好地说明了人对自然的控制——至少是人群中那些没有违反社会正常规则的人,包括对自然本身予以适当尊敬的规则。因此,对于传统文明来说,自然必须由人来驯服和统治。它显示出了许多危险的特性,因而人必然通过适当的社会实践来行使他的统治。但同时,自然又被看作是非常脆弱的,必须保护它免受人的侵犯与干扰。这些懂得人工匠心之正面(及危险)的特点的实践,正处于社会的核心,是它们奠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然而近来,人们对社会规则的专断越来越提出质疑,而对个体的自我倍加重视,随之而来的是,自然在西方人的背景观念中的位置颠倒过来了。在此,我将对这种位移的某些重要后果作一回顾。

对这种颠倒了自然与人为的相互位置的转变进行究根探源,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此处我将描述一下这一转变如何危险地确定了西方的未言明的思想方向,这思想的结果是产生了最为危险的习惯,由它们会扩散出堪称是险恶的疾病和观念。

人类的天性

人是万物的尺度。从婴儿的诞生之日起——甚而更早于彼时——他(她)就已经开始扎根于一种文明之中,这文明使用某一给

① 拉丁语 ordalium,意谓“死神判决”,多半通过野蛮的实际考验,如在火上行走,服毒等。如果被考验者无罪,神会保佑其平安无恙。

定的语言,奉行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因此,对每个人的初始要求,并不是对这语言及习俗的来源提出疑问,而是把它们当作自然而然的事接纳下来。长期以来,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其成员相信,他所属的位置是惟一恰当的位置,它知道应当怎样举止,怎样理解周围的事物。然而,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所属的社会并不是世界上的惟一的社会。其他的社会也存在着,它们有着另外的实践,另外的语言,另外的习惯,以及另外的世界观。“成人”仪式的深刻功能——只有极少部分经过这种仪式的人真正明白这一功能——就是使个体理解并且接受,社会实践是人工的,如果他或她降生于别处,他或她就会以另外的方式行动或者信仰。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这样,非洲大陆的撒哈拉以南地区就成了进行社会实验的场所,在这个实验室中,各种类型的社会结构都可以得到检验,并使它们面临成百上千的行为及语言。但这些各异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人类的天性,是由许多具体社会实践所规定的。而成人式的目的,也正是使个体通过接受他或她所在社会的符码、语言及规则,而真正成为人类的一员,这些符码、语言及规则虽属人工的,但也正因此而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因此,对人性的定义也就关系到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体必须具有并且服从于专断的规则。人类被其社会实践所定义,因为他们通过语言与符码而承继遗产,而从属于完全与自然相异的领域。

当然这种行为在全世界皆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南方还是北方。但是,在世界上各异的文明中,有些却具有推广某种普适真理的雄心,他们愿把这一真理推及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样就能使所有人都成为人类的一部分。对这一现象及其根本原因(一神论宗教及科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加以讨论,在本文是不适当的。此处仅指出一点,为这种普适行为提出解释的原因有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对人性的规定已经由社会定义转变成一种风行各地的“普适”的定义,一种个体、自我的定义(使我成为人类之一员的,正是我自己,一个具有各种价值的个体——事实上,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价值,是由财力所决定的,是可以买下的)。这种从社会价值到个

人主义价值的转变,其发生的语境是,人口的分布,由于迅速的城市化,由全境分布而为严重的地区集中性分布所替代。

在此背景下,自由之观念本身也披上了怪衣。它重又回到了人类社会建立之前的状态。当越来越少的社会法则越来越多地制造出自发的集体行为之时,现在的自由与古老的“强者定律”已十分相似。这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个体的自发性,只认得与之接近的自发性,这便很容易产生自发的集体行为。我清楚地记得在巴黎地铁打出的一批广告,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向西方开放。这是些为蓝色牛仔裤作的广告:画面上是东方人,广告词是,“如今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了,我们应当选购这种裤子。”注意这则广告是明确地谈论自由、谈论个体行为的,但是很清楚,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正是自由的反面——是奴役,以及集体自发行为——因为广告出资者的目的,是让十亿中国人都穿上同样的蓝裤子!如今这已成事实,一个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很难发现任何地方没有男人和女人穿着同样的衣服,同样丑陋的蓝牛仔服。这简直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对奴役的重建。有趣的是,这一点显示出一种权力的转移,从建立于数世纪的反思与实践之上的社会结构权力,转移到了少数狡智的投资者的权力。与裤子一例相同,我们也可以从汽车、电视机、极其泛味的旋律、千篇一律的噪音等等之中读出同样道理。探讨一下是什么对人性作出规定,其中有什么新的意义,将是非常有趣的。但这不是本文的目的,让我们重新回到自然与人为。

自然与人为

前面一段意在设置舞台布景。风靡西方文明的自然新概念,必须被置于这种高度城市化的语境之中,置于强调自我、强调由此而产生的集体自发无意识行为的语境之中。城市里充满了人造物品,房屋、街道、汽车、电灯……不时会出现一棵树,或者是一座公园,但被监禁在隔栏之中:鸟也是有的,但品种极为有限。而在城市之外,比如在法国,构成风景的是丑陋的招贴画,各处的房子都毫无

魅力,而且,由于绿色革命的结果,大片大片的玉米地与麦田整齐划一到了极点,没有昆虫,没有罂粟,没有矢车菊。连自然也成了人工的。甚至在市场上,水果的大小是符合标准的,找不到斑点,形状一致。年复一年,水果的种类也越来越少,代之而来的是来自其他地区、其他气候带的标准化的水果,四季如一。人造的灯光、暖气及气候调节已使四季的观念渐渐淡化消失了。

自然,原是人类社会必须去驯服、保护,同时又心怀畏惧的,或至少是需加以控制的对象,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模糊的力量,人类难以轻易驾驭。突然之间,它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人们对它满怀思乡之情。在如今的社会里,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去做(或尽力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不受限制,现在还有了新法律的支持,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仅是一个回忆。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有多么无知,也忘掉了在以往的社会中我们曾经经历的宗教的敬畏,而自然已退居为某种游戏,供我们在动物园或者电视中观看。我们怀念自然,我们对它不再感到恐惧。事实上,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我们不能轻而易举地到达的地方了,大概只除了最寒冷的地带。即便是神秘无限的撒哈拉,也要每年蒙受可怕得难以置信的汽车与摩托车大赛的戕害,留下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也抹拭不去的令人厌恶的痕迹。这里,充当破坏文化艺术的汪达尔人角色的,并不是士兵,仅仅是游客而已。人类社会曾经与礼仪和实践控制之下的力量分享世界,与脆弱而又令人敬畏的自然的力量分享世界,而人则在宇宙中仅占极微小的地位。而现在,全能的婴儿期的自我以其无知的形象已经完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下面以几个例子说明西方社会近来的这种姿态所带来的后果。

示例

虽然人对自然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或许也正因如此),近年来许多疾病(重新)出现了。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是艾滋病,它的流行是与人们对人体物质,尤其是血液的缺乏了解密切相关的(甚至

畏惧也会使人有更好的洞察力)。很清楚,艾滋病是一种传染性很差的疾病,它本来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得到如此的传播。这种疾病,以其极端严重的影响,说明了社会纽带分崩的后果,以及将这些纽带代之以自我的婴儿期规则的后果。显然,直接/间接地牵涉到血液的社会实践(输液、扎针、皮肤划破、任何对身体的暴力/相关疾病),使艾滋病毒如同火星遇到干燥的草原,迅速蔓延。事实上该病仅仅起源于为供食用宰杀猿猴的行为。可能是在非洲中部,染病动物的血液传染了屠夫,结果是疾病通过人与人的接触而传播开来。该病很可能已在人们中间存在了很长时间,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力量,其传播受到很大局限,仅有极少数人被传染。病毒从非洲来到美洲,在那里,由于社会结构的缺失——或者说支持个体行为而非社会约束的社会结构的流行——使该疾病遍及全世界。而非非洲,由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以及无限制的城市化,破坏了阻止疾病传播的篱障,使得不久前还具有免疫力的民众,也开始遭到病毒的侵袭。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例子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与我们目前应当面对的问题无关。我选择该例的原因,是由于我认为,艾滋病将成为我们要长期面对的一种瘟疫,其原因是我们已经破坏了以组织人类行为为目的精心建立的社会关系,替换了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为的精华,代之以一种未言明的自然概念,而它具有极端危险的前景。对自我的膜拜蕴含于对即时快感的强调之中,就如回到无知儿童的自然状态。

在未来几年中,风行全球的自我将展开与公共利益的争斗。其后果将是令人瞩目的。从道德的原因来看,这一点很明显(假如一个人具有道德价值观,与普世的利益价值观形成对立,后者尊崇新的上帝,即“金钱带来快乐”)。但是我恐怕就连需要道德行为的想法也已在西方过时了。“政治正确”的“伦理”一词被使用,正是由于世界的“道德”已经几乎被看成是猥亵。让我们选出即将成为公众话题的一个例子。人类的寿命不断得到提高,几乎在哪儿都是如此。这一事实的结果是,染有各种疾病的老年人的数量急剧上升。

许多疾病在技术上可以被治愈,其中一些需要更换患病器官(肾脏、肝脏、心脏)。到目前为止,新器官均是来自年轻死者,通常是死于车祸(愤世嫉俗者可在其中发现不要过于激烈地反对对这些危险的机器征以重税的原因)。但是,新鲜器官供不应求,若能找到其他可用器官的途径,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异种移植(即移植动物器官于人体)是一有趣的出路,但移植拒绝现象极为严重。因此,科学家提出要将动物(猪或猴)“人化”,即培育出跨基因动物,它们的组织适应性标记(移植器官的上皮细胞表层抗原)将与人类的相同。培育这种动物的动机是直接受促动于病人的个体利益的。当然,还有一个金钱价值方面的非常重大的动机(对生产这种动物的集团,以及实行移植手术的医生有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并未对这种作法带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它确实存在)予以足够重视。

这一问题与我们今天对自然的看法有关。猴与猪都是与人类十分接近的哺乳动物。这是它们的器官可用于置换我们的器官的原因。这是上述建议显得十分自然而又十分另人惊异的原因。也正是这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做法从病人个体自我的角度来看是有益的,而对社会整体来说又是极端危险的。在哺乳动物的细胞中,蓄养了许多病毒。这些病毒常常在动物中引起轻微的传染,正如某些病毒常在儿童中得到传染一样。其在正常状态的寄宿主体(normal host)中,被加以改变而接受下来,并且被削弱。相反,当从其从寄宿主体转移到人体内时,它们便很有可能引起传染性极高的或具有莫测性质的病毒的产生,例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如果病人器官携带逆转录酶病毒多年,则更是极大地增加了这种危险,动物病毒与寄宿主体的逆转录酶病毒的结合也更加容易。这将为病原体侵袭人类提供新的实验场。人们不能只考虑这种做法对延长接受移植手术者的寿命方面的显然的利益,而忽视确实存在的这种危险。我已经谈到艾滋病毒可能起源于对猿猴的宰杀。那么,是否有迹象表明,杀牛可能也会成为疾病的起源?不幸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很清楚,人直接接触新鲜血液十分危险。动物与人越不相像,危险就越小;在猿猴类,危险